

· 历史与文化研究 ·

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

——基于历史视角的考察

何悦

(攀枝花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院 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服饰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与鲜明的价值取向。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通过仰视优秀传统文化,正视现实问题,远视文化发展,从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服饰;文化;历史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63(2019)04-0080-05

DOI:10.13773/j.cnki.51-1637/z.2019.04.014

服饰是人类最为重视的生活要素,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衣”排在第一位。古代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之于华夏,有着根本的意义。服饰文化是中国源远流长历史长河中一支无可替代的文化支流。它上起史前,下至明清,每个阶段都有其奇特闪光的地方,风格各异却又一脉相承,几乎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中国人就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喜好、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当中,形成了独特的服饰文化内涵,它既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又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原始社会蒙昧的服饰文化

在原始社会早期,中国的先民在深山丛林中穴居。因为脱离了动物界,体毛慢慢弱化。为了防御严寒、遮阻风雨及炎烈的日照,遮挡虫兽的袭击,他们披树叶,裹兽皮。这种用自然物质遮裹身躯的方式,是人类向创造服饰迈出的第一步。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开始用骨针缝制衣服。

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山西朔县峙峪人生活的洞穴里,都曾发掘出各种用兽骨制作的骨针。这不仅开阔了服装的设计思路,而且丰富了服装的形制及样式,原始社会的服装制作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原始社会中,中国先民对玄秘的自然无法解释,出现了自然崇拜。当时服装色彩及纹饰多取象自然,较为充分地体现出了古人的世界观。《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1]这表明以上衣下裳为基本形制的服装,在黄帝尧舜时期已经流行。这种因为对天地的崇拜而产生的服饰上的形和色,影响了整个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二、夏商西周礼制的服饰文化

服饰文化作为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到奴隶社会,成为“礼”的重要内容,除了装饰、实用以外,还有了另一层含义,即等级差别,纹样内容的政治意义大于审美意义。以冕服为中心逐渐

收稿日期:2019-03-17

基金项目:本文系攀枝花学院2017年度思想文化专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价值及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何悦(1984—),男,重庆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传统文化。

发展起来的章服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并视为服制之源,效仿传承。从此,上自天子卿士,下及黎民百姓,服饰各有不同,不得僭越。衣冠服饰自此成为统治阶级别贵贱、辨尊卑的一种工具。

冕服源于夏商,在周朝形成定制。冕服由冕冠、玄衣及纁裳组成。冕冠的基本形制是:冠的顶部面覆冕板,上为玄色,下为黑色,称“緌”,前低后高,多为长方形,或为前圆后方形。冕板前后边缘垂挂一排冕旒,旒的多少视佩戴者的身份决定,有三、五、七、九、十二之分,以十二旒最为高贵,是帝王的专用。冠的两侧各有一孔,是用来贯穿发笄使得冠固定在头发上的,玉笄两端结有绕围于额下的冠纓,名“紘”。冠的双侧各系一根名为“紕”的丝带,天子诸侯用五色,其他人用三色,各垂一名为“瑱”的饰物,又称充耳。其作用据说是提示戴冠者勿听谗言,后人所说的“充耳不闻”即由此而来。玄衣纁裳是冕服的主体服装,为上衣下裳形制。上衣纹样一般用绘,下裳纹样则用刺绣。所绘纹样视等级高低而异,以十二章为贵。中国奴隶制社会到战国期间宣告瓦解,但“十二章”却一直为历代的帝王采纳,直至近代的袁世凯复辟,它是中国儒家学派服饰理论体系的核心。

三、秦汉“天人感应”的服饰文化

秦统一中国前,各国衣冠异制。各学派都坚持自家的理论,道家主张“被褐怀玉”;儒家主张衣冠服饰应恢复周礼,提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文质彬彬”;墨家主张衣冠服饰应以节用、尚用为目的,不必过分奢华,“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荀况则强调“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法家韩非主张崇尚自然,反对修饰。秦并天下后,“兼收六国车旗服御”,化各国之异为同,衣冠制度大一统。汉代秦以后,大体上保留了秦代的遗制,故有“汉承秦后,多因其旧”之说。因而秦、汉服饰有许多相同之处。

秦始皇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夏是木德,崇尚青色。殷是金德,崇尚白色。周是火德,崇尚赤色。代火者必是水,下一个王朝应是水德。这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秦灭六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也说明了为何秦灭六国后,以水德自誉,而且服饰以黑为贵。西汉的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的思想,

把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建立起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它成为不同朝代崇尚不同色彩,并以此色为贵的主要依据。^[2]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为中国服饰色彩审美思想的发展与嬗变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四、隋唐开放的服饰文化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重新统一,疆域广阔,社会安定,对外交流频繁,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社会经济文化呈鼎盛之势。与此相适,隋唐服饰不仅继承了前代服饰的优良传统,而且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中进行服饰发展和创新,使服装样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局面。其中,着襦裙服、以露为美、女着男装等成为那时几个最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短襦长裙为唐朝女性服饰的最基本形式。唐朝襦裙将先秦、两汉襦裙之大气阳刚与魏晋时代的飘逸阴柔相结合,将大汉民族的温文尔雅与少数民族的豪情健爽相结合,衍化出独特的款式和造型,是中国古代襦裙发展史上最繁荣活跃的时代。唐朝襦裙服装的整体形制主要包括襦、裙、披帛和半臂四种构成要件,上身为小袖短襦,下着紧身长裙,配披帛,加半臂。唐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襦裙服风格大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初唐承袭隋代旧制,“尚危侧”,“笑宽缓”,以小袖襦衣配长裙为主。中唐之后,华夏意识增强,服饰中加强了华夏的传统审美观念,款式日益宽大,近乎病态,流行“大袖纱罗衫”,致使太和年间朝廷不得不制诏以限定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已上。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由于裙幅的增加,裙上的折裯也明显增多。发展到后来,又出现了百褶裙的款式,这一特征在五代之后反映得尤其明显,史书中有“百叠”、“千摺”等描绘,便是指这种裙式而言。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褒衣博带”是一种内在精神的释放,充分追求自我,厌华服,而重自然。而唐朝的服饰则是对美的释放,对美的大胆追求,女子衣装之开放是唐朝以前的封建社会从来没有过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种袒胸而不穿内衣时尚的流行。唐人诗词中“粉胸半掩疑暗雪”、“雪胸鸾镜里”、“胸前瑞雪灯斜照”、“二百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便是对这种袒露的切实描写。这种

不着内衣,将胸部裸露于外以此展现女性健美胸部的服饰形态,不光是唐朝社会思想开放的直接表现,更反映了妇女精神的思想解放。正由于有了这种解放,盛唐时期的妇女才得以随心所欲通过服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更大胆的方式展现着女性身材优美的曲线和自信。

在封建社会女子着男装,会被斥为“不守妇道”。笑不露齿,站不倚门,行不得露面,被奉为妇女必须恪守的信条。《礼记·内则》云“男女不通衣服。”封建统治者认为男子主于外,女子主于内,故有男女服饰制度,使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若女子男装,会出现牝鸡司晨的事,是家庭的不幸,国家的不幸。而在唐代,女着男装成为一种时尚。这一风俗表现了唐朝独有的服饰审美心态——平等、宽容与开放。这既是对封建服饰礼制的一个巨大挑战,也是中国服饰史上的一个闪光点。

五、宋代内倾的服饰文化

唐朝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而宋代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两者有很大的差异。^[3]宋代的服饰特点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程朱理学是宋代的统治思想,它主张“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至恶的”,存天理,必然灭人欲。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人们的美学观念也相应产生变化,服饰文化不再像唐朝服饰那样追求华丽、丰满和生机勃勃,推崇传统,朴素和理性成为宋朝服饰的主要特征。最能反映程朱理学影响的是平民服饰及审美异化表现——缠足,它们共同体现出宋朝特有的时代风貌。

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统治阶级“惟务洁淨”、“不得奢华”服饰观念的推行,使宋朝平民服饰更为简朴实用,贴近生活。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展示了北宋都城汴京社会各阶层居民的服饰特色。男子的衣着大致有“长衣帮”、“短衣帮”之分。身着长衫的大多是官吏、商贾、文人、有钱的市民,头戴巾子或蹀头,下身穿长裤,足蹬靴履,衣身较宽松,整体线条简洁。相形之下,凡是体力劳动者,如担夫、农民、小贩、商家等,上衣都很短,多是短襦或短衫,下身穿裤,头戴头巾,赤脚穿麻鞋或草鞋。士、农、

工、商各具本色,服饰的限制极为严格,从穿戴上不仅可以看出等级差别,还大体可以知道他们从事何种职业。

六、明清等差的服饰文化

衣冠禽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含有贬义的成语。这个成语顾名思义,是指禽兽披着人的衣服戴着人的帽子。但在明朝中期以前,衣冠禽兽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赞美词,它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中国封建社会官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以官员服色来辨等级。真正作为代表官位的补子制度,则定型于明代。文官儒雅娴静,官服以禽鸟为图案纹样,以彰显其贤德;武官勇武彪悍,官服以猛兽为图案纹样,以彰其威仪。官府上的补子隐含了对文臣武将安邦定国的厚望。明朝这一创制,延续到清朝,成为封建等级制度尊卑高下最突出的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亲近与和谐,遵循“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人们将对于生活的向往寄托在自然的力量上。这种哲学思想在婚礼服饰的色彩、图案和款式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如婚礼服饰色彩从天玄地纁,到纯白,到青色,到绛红,到大红之色,运用龙凤、祥云、花草叶茎等自然界动植物图案,都表现出一种中国所独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符号语言。提及传统的婚礼服饰,我们当今最熟悉的彩绣龙凤的凤冠霞帔、大红盖头以及大红吉服,出现的时间较晚,到了明朝才有明确的定制。凤冠是中国古代妇女首饰中最为华贵的一个篇章。凤冠,俗称珠冠,又可称钿子冠,因以龙和凤凰点缀而得名。它既是权威的象征,又是高贵的标志。“凤冠霞帔”,可以说是明朝大多数妇女在着装上的最高追求目标,真实再现了女性对美的渴望、浪漫的追求。

马蹄袖、马褂和瓜皮小帽是最有特色的清代服饰。马蹄袖由传统胡服的箭袖发展而来,是附在袖口上长下短的马蹄形袖头,卷起来便于射箭及操作,放下来则可以抵御寒冷,既具备实用功能,还有很好的装饰效果。清入关后,成为礼服定制。马蹄袖平常挽起成马蹄形,凡臣下朝见君主,下属赴见上司,晚辈侍奉长者,必须先左后右地放下袖头,才可行拜见礼。马褂是清朝最有特色的流行服装,长到腰,便于骑马,袖到肘,便于射箭,

所以叫马褂。马褂颜色有蓝、紫、灰、黄多种,以黄色为贵。因为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被崇尚”的颜色。《说文解字》对“黄”的解释是“黄一地之色也。”^[4]“黄道”,是古人想象中的太阳绕地的运行的轨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黄色居五色之首,是“帝王之色”。据班固的《白虎通义》中记载“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古不易。”^[5]这种中和色与中华民族的性格相吻合,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人的潜意识当中。在清朝,能获取天子赏赐的黄马褂,是一种至高的政治待遇和无上荣耀。清代男人戴的帽子也是颇值得一说的,最为大众化的帽子是名为“瓜皮帽”的小圆帽。瓜皮帽创立于明朝,相传来源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创的六合帽,取六和一统、天下归一之意,流行于清朝。制作时先将布片剪成六瓣,然后缝在一起,形如倒扣的瓜皮,瓜皮帽因此而得名。如今,在有关清朝和民国时代的电影、电视剧中,我们仍能时常看到它的影子。

七、近代革新的服饰文化

中山装是社会思潮的变迁和革命的演进的产物和代表。一方面,“西学东渐”思潮提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机遇,形成推动中国服饰改革的强大外力。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效仿洋人,穿西服、西裤,用手帕、围巾等。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又为中国服饰的变革扫清了障碍,并注入充足的能量,使近代服装发生了质的变化,是中国服饰从传统向近现代变革的重要历史进程。

顾名思义,“中山装”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现代化中式男子服装。中山装自辛亥革命后首创到20世纪50年代的广泛流行,再到现代各界社会名人的演绎,中山装的自身属性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变的是中山装的灵魂。它凝结了中华民族一个半多世纪的不懈抗争,记载下了中国共产党人慷慨悲歌和斗争历程,彰显了中华民族勤奋、创新、严谨、自信的伟大品质。身着中山装,意义深远,既有不忘革命传统承继革命先烈之志,还有开拓创新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之宏愿。

关于中山装由孙中山创制,学术界没有疑义。但对于中山装的原型与由来,诸说不一,还没有定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来自

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二是也有人指出中山装的主要参考来自中国。三是源自西服的改进。对于中山装起源的探讨,应该把视野扩大到世界和中国的服装史领域,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服装的款式和色彩的简单化,主要是被军装所带动的。随着军装的简单化,欧洲男子服装也开始了简单化的改革潮。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和服装,是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才开始逐渐西方化、简单化、合身化的。孙中山借鉴了日式学生服和西式军便服,结合中国国情,融入中国服饰文化传统,改制成既带有军装风格,又不失文雅气韵的中山装。

中山装的诞生,是与辛亥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穿着中山装成为拥戴革命、与清朝封建主义决裂的一种标志,是革命思想普及的外在体现。它最大的特点还是开放。从形上来讲,它颠覆了传统“长袍马褂”中的上衣下裳式定制,从而变为对襟式的上衣下裤式;从服制上讲,它完全打破了传统等级冠服制度,不受阶级、地位和级别的限制,官民能够选择款式、质地、颜色相同的衣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穿着中山装表达了人们对平等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近代服制对古代服制的扭转。越加经济实用。五粒纽扣排列成一条直线,既提神醒目,又增强了服装的节奏、韵律感。中山装领子结构设计,突出了实用性:采用封闭式的立翻领,既容易裁剪,还解决了受冻之忧,同时很好的避免了西服穿衬衣配背心和领带的繁文缛节,又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中山装的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另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适应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穿用。

旗袍,是最为现今世人所认同和推许的中国服饰之代表之一,是中国光辉绚烂的传统服饰的代表作之一。从纵向上看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沉淀的结果,而从横向上看又是与其他外来文化不断交流与碰撞的产物。旗袍追随着时代,承载着文化,表现着修养,显示着美德,演变为天地间一道绚丽的彩虹。学术界一般认为,旗袍是由清朝满族旗装传承而来,民国时期流行的旗袍款式有诸多满族旗装的特点,如窄袖、连肩、紧身等服饰特征均在当时的旗袍上有所体现。

辛亥革命后,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梏消除,最先穿着旗袍的汉族妇女是一批上海的女学生。到20世纪20年代,旗袍成为受到城镇女子普遍欢迎的服装,其原因包括:其一,裁剪制作比较简单,一块布料从上到下一次性裁剪成形,免去上衣下裙的制作工艺,适合家庭妇女裁剪制作。其二,衣料选择多样化,可以是高档的锦缎、丝绒,也可以是极普遍的民间印花布。前者雍容华贵,后者朴素大方。其三,款式随意,衣身可长可短,袖子可有可无,领子样式繁多,低领、高领、元宝领、风仙领等等。其四,老少皆宜,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穿旗袍显得稳重大方,身段丰满的中年妇女穿旗袍显得身姿秀逸,身形苗条的少女穿旗袍显得稳重大方。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旧社会制度灭亡,旗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不爱红装爱武装”,“以穿红戴绿的‘资产阶级小姐’为耻”的口号在建国初期改变了人们一时的审美习惯,“十年文革”也成

为旗袍在大陆完全销声匿迹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展,消费能力提升,加之中国消费者对服装的要求越趋讲究,掀起了一阵旗袍风。见证了历史步伐,承载着历史文明,昭示着民族修养,体现着民风美德的旗袍愈来愈被世人接受和认同。

参考文献

- [1]张善文.周易系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3]杨芳.从谚语看中国的服饰文化[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5]班固.汉书白虎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魏净]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pparel Culture

—An Investigation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E Yue

(College of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nzhuhua University, Panzhuhua 617000, Sichuan)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ys stress on the promotion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in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Apparel culture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fin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flecting the unique way of thinking and distinct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peop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pparel cultur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looks up to 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visions the reality problems and looks forward to cultural development,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apparel; culture; history